

从“两善对峙”到“善恶斗争”

——黑格尔悲剧冲突论述评

丁尔苏
(香港岭南大学)

【内容摘要】

本文讨论黑格尔的悲剧“冲突论”如何为文学和艺术评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关注点。在他之前，戏剧诠释受到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影响，沉迷于人物性格分析，忽略作品的整体构思以及作品与外部历史之间的宏观联系。然而，黑格尔的“冲突论”不无缺陷。除了几乎被学界抛弃的“和解说”以外，黑格尔对冲突的理解过于狭隘。“两善对峙”的戏剧情景确实令人揪心，但这远不是悲剧冲突的全部。我们有必要对黑格尔的理论加以改造，使之囊括发生在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只有一个全面的冲突理论，才能更加有效地解释古今中外的悲剧文本。

【关键词】

黑格尔；悲剧冲突论；“两善对峙”；善恶斗争；亚里士多德；辩证逻辑；悲剧冲突论；和解说；净化说

悲剧理论的开山之作《诗学》问世于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在此后两千一百多年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几乎独领风骚。直至19世纪初，欧洲大陆才见证了另一位悲剧理论大师的诞生，他的全名为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黑格尔关于悲剧的论述散见于其哲学、史学、伦理学或美学著作之中。根据美国圣母大学马克·罗希（Mark W. Roche）教授的统计^①，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至第五章里讨论了索福克勒斯悲剧《安提戈涅》的人物刻画、剧情发展以及罪责评判；他在《历史哲学讲演录》导论里阐述了历史进程中个人如何有意无意地影响事态发展并因为生不逢时而酿成悲剧；在《哲学史讲演录》里，黑格尔通过辩证法将苏格拉底作为悲剧人物进行分析；在《宗教哲学讲演录》里，他谈及古希腊文明以及悲剧冲突之和解。涉及悲剧最多的是黑格尔的《美学》，该书出自他1818至1829年间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的讲稿以及学生课堂笔记，由海因里希·古斯塔夫·霍托（Heinrich Gustav Hotho）整理而成。为了方便后人进行学术研究，美国学者安妮·保卢奇和亨利·保卢奇（Anne and Henry Paolucci）夫妇又将黑格尔零散的悲剧论述收入专集，题为《黑格尔论悲剧》（*Hegel on Tragedy*），由达布尔地（Doubleday）出版公司于1962年首次推出。

黑格尔悲剧理论的显著特征是对戏剧情节中“冲突”因素的强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与不同的历史观。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就是“精神”自我演变和完善的辩证过程。作为普适的抽象概念，“精神”必须在特定的时空里得以实现。也正因为此，在最终返回自身之前，“精神”的诸种表现形态都是片面的，它们之间经常发生误解和冲突。值得欣慰的是，“精神”的世界之旅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无论鹿死谁手，理性自身都能从中吸取教训，导致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的改善。按照这样的解释，历史就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

^① Mark W. Roche: "The Greatness and Limits of Hegel's Theory of Tragedy", in Rebecca Bushnell eds., *A companion to traged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p.52.

断向前迈进的辩证过程。

同样的辩证逻辑也贯穿于黑格尔关于悲剧的论述之中。例如，他在《美学》第三卷下册里这样说：

一切外化为实际客观存在的概念都要服从个别具体化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各种伦理力量和各种发出动作的人物性格，无论在内容意蕴上还是个别显现形式上，就得相互区别开来，各不相同。按照戏剧体诗的要求，这些相互区别开来的力量就须显现于活动，追求某一种人类情致所决定的某一具体目的，导致动作情节，从而使自己获得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力量之间原有的和谐就被否定或消除掉，它们就转到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从此每一动作在具体情况下都要实现一种目的或性格，而这种目的或性格在所说的前提之下，由于各有独立的定性，就片面孤立化了，这就必然激发对方的对立情致，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①

这段话里的“伦理力量”指的是亲情、国法、教规、荣誉、尊严、友谊、爱情等基本的人类志趣。它们虽然不是神性本身，但仍然是“某一普遍真实的东西的子女”，所以对戏剧人物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迫使他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然而，不是所有的伦理内容都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社会历史中的人因为受到时空、种族、阶级、性别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只追求其中一种或若干种理想，形成所谓个人“情致”。性情迥异的人相遇，必然产生误解和引发冲突，导致戏内戏外一出出人间悲剧。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所展示的正是这种伦理冲突。剧中女主角安提戈涅是亲情的化身，她悍然违抗国王禁令，坚持为叛国亡兄波吕涅克斯下葬；男主角克瑞翁则代表国法，他毅然不顾血缘纽带，坚持惩罚一切违背城邦利益的行为。应该说这两个人物的行为都不是一时兴起，反复无常。相反，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5—286页。

他们恪守各自的道德原则，义无反顾。在特定的范围内，他们的信仰都是“有辩护理由的”，但同时也具有极强的排他性，看不到对方立场的合理性。像这样的正义人物相互碰撞，造成的后果往往非常惨烈。在《安提戈涅》的最后，不仅女主角舍命殉情，其未婚夫和未来的岳母也随之而去，给观众留下万分遗憾。

作为批评理论，黑格尔的“冲突论”对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它非常适用于那些着重展现伦理观念之冲突的悲剧作品，尤其是古希腊悲剧。虽然亚氏在《诗学》里也谈及戏剧行动的重要性，并且置情节要素于性格要素之上，但他对悲剧人物的规定导致了后世评论家过多关注悲剧主人公本身。还以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为例，以往评论家大多遵循亚氏的“过失说”，努力在两位主人公身上找出酿成悲剧的性格瑕疵，但成效甚少。其中的原因不难想象：无论安提戈涅还是克瑞翁，都不是亚氏在《诗学》里所规定的那一类不好也不坏的普通人；相反，他们是追求道德理想和坚持伦理原则的典范。安提戈涅为了家庭亲情而奋不顾身，克瑞翁为了城邦利益而大义灭亲。分开来看，他们的勇敢和执着可歌可泣，但互为对立面则两败俱伤。黑格尔这样描述“两善对峙”（the collision of two goods）：

这里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思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思想而陷入**罪过**中。^①（“**辩护理由**”“**罪过**”二词加重来自原文）

许多评论家没有领会这段引文的真正含义，他们死死抓住出现在最后一句话里的“罪过”概念不放，努力在安提戈涅和克瑞翁身上挖掘性格瑕疵。于是，这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6页。

两位人物的勇敢和执着被解读为傲慢与固执，成为引发悲剧的罪魁祸首。这样的解读显得牵强，难以服人，因为几乎所有坚持信仰的行为都可以被看作固执己见，其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还有评论家因为无法在安提戈涅身上找到真正的缺点，他们干脆将刚愎自用的克瑞翁看成该作品的主人公。这一解读方法显然不恰当地贬低了安提戈涅在剧中的地位，也不能令人信服。事实上，性格瑕疵在这一类悲剧中已经不那么重要，值得我们关注的倒是那些悲剧人物所代表的相互冲突的伦理观念或道德原则。根据美国学者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的研究，像这样着重呈现伦理冲突的古希腊悲剧还有很多，其中包括埃斯库罗斯的两部三联悲剧《奥瑞斯忒亚》和《普罗米修斯》，以及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和《希波吕托斯》。^① 这表明黑格尔的悲剧“冲突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相当广泛的应用性。

从史学层面看，黑格尔的“冲突论”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悲剧作家对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关键人物的立场。按照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悲剧不仅呈现各种伦理观念之间的冲突，而且还能揭示它们背后的深层历史原因。在社会发展稳定时期，人们和睦共处，悲剧鲜有发生，但在历史转型时刻，新、旧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经常引发尖锐矛盾乃至激烈斗争，造成身体或心灵的巨大创伤。有些悲剧人物所代表的是已经或者即将过时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尽管他们顽强抵抗，坚守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合理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但最终因不合时宜而被历史潮流冲走。埃斯库罗斯描写两代人恩怨情仇的三联剧《奥瑞斯忒亚》可做一例。在这一悲剧系列中，阿伽门农为了安抚因久久不能启航而躁动不安的希腊军队，不惜牺牲女儿伊菲格湿亚的生命，祈求吹向特洛伊城的顺风。胜利归来，他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替女儿报仇，将其杀害。他们的儿子奥瑞斯忒斯又替父报仇，杀死母亲。复仇女神们不能容忍这样的弑母行为，因而紧追不舍，跟他算账。剧终前众人来到雅典，智慧女神雅典娜在那里设立审判法庭，控方是满腔怒火的复仇女神

^① Walter Kaufmann: *Tragedy and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00—212.

们，辩方是代表理性的阿波罗。多亏雅典娜投下决定性一票，雅典法庭最终判定奥瑞斯忒斯无罪。就历史演变而言，复仇女神们代表的是私了怨恨的古老血腥传统，阿波罗和雅典娜则代表通过社会斡旋的司法审判。埃斯库罗斯相信，野蛮的血腥复仇应该让位于文明的司法判决，这一立场从他对前者的贬义描述之中可见一斑。在另一方面，有些悲剧主人公具有很强的超前性。他们代表未来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因而遭到身边的人乃至整个社会的误解和压迫。为了坚持自己的理念，他们奋起反抗，但终究因为生不逢时而蒙受苦难或者死亡。易卜生笔下的海达·高布乐就属于这一类型。她向往自由，桀骜不驯，与维多利亚时期的主流男权传统格格不入，最终饮弹自尽。这些例子表明，悲剧（尤其是历史剧）的意义有时超出个人的恩怨情仇，它们还能够折射新、旧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揭示作家对相关历史事件及人物看法的感情取向。

黑格尔的“冲突论”当然也有不足之处，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把所有悲剧冲突双方都看成是“同样有辩护理由的”，这种“正面的力量”^①完全相等的情形其实很少见。罗希在《黑格尔悲剧理论的优缺点》一文中指出：

黑格尔关于所有悲剧冲突之对立面都价值相等的说法不可能正确。虽然黑格尔对《安提戈涅》的解读具有权威性，但古典语文学家们不愿苟同，这已经一目了然。事实上，黑格尔使用的语言也有违其整体解读立场，少许流露出对安提戈涅的偏爱。尽管如此，倘若我们把黑格尔的意思理解为在最佳悲剧里冲突双方的力量旗鼓相当，那么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的。^②（“相等”和“最佳”词加重来自原文）

换句话说，势均力敌的正面力量发生冲突确实具有很强的戏剧性，无论哪一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1页。

② Mark W. Roche: "The Greatness and Limits of Hegel's Theory of Tragedy".

方受到伤害或者同归于尽，都不是观众希望在舞台上发生的，故而扣人心弦。然而，这样的生活情形和戏剧结构毕竟罕见，我们不仅应该关注“两善对峙”的冲突，而且还要看到更为普遍存在的“善恶冲突”(the collision between good and evil)。

按照罗希接下来的论述，呈现善恶冲突的悲剧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大类：即顽固不化型悲剧(tragedy of stubbornness)和自我牺牲型悲剧(tragedy of self-sacrifice)。在前一类作品里，主人公通常是道德品格低下或者性格暴戾的负面人物。这些人物的为了实现自身目的，不惜工本地扫除一切阻挡他们前进的障碍。虽然他们也会短暂地良心显现，延缓倒行逆施，但终究还是以本人志趣为依归，不顾他人死活，给社会或身边的人造成伤害。这些悲剧人物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们的性格非常固执，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欲望，再加上他们超常的体力、智力、乃至魔力，具有极强的破坏力。黑格尔本人也曾论及这种“形式上的伟大”(formal greatness)：

按照此种掌握方式，动作情节的具体内容并不是伦理的辩护理由和必然性，而是我们兴趣所在的那个具体人物及其关心的事情。从这个观点看，提供主要动机的是爱情和功名心之类，甚至不排除犯罪行为……所以这里人物性格首先必须至少在形式上是伟大坚强的，有能力抵挡一切消极因素，有勇气接受他的命运，既不否认自己所做的事，也不因此就垮塌下来。^①

这一论述非常适合欧里庇得斯的名剧《美狄亚》。女主角美狄亚我行我素，性格暴戾。年轻时她违背家人意愿，不惜将兄弟剁成碎片，与前来索取金羊毛的伊阿宋私奔，结婚生子。然而好景不长，伊阿宋现在打算与国王女儿成亲，美狄亚为此妒火中烧。令人恐惧的是，美狄亚是一位极其能干的女子。为了报复丈夫，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第299页。

她假装替他着想，用计谋害死新娘和国王，随后杀死亲生儿子，以断绝伊家后代。像美狄亚这样的悲剧人物还有很多，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笔下篡国弑君的麦克白，他们虽然没有高尚的情操，甚至不惜跨越道德底线，但他们的超常能力和破坏性仍然对观众有很大的吸引力。

另一类展示善恶冲突的悲剧是自我牺牲型的。在这一类作品中，主人公大多为人诚恳，心地善良，却历尽磨难，乃至失去生命。从主题上讲，自我牺牲型悲剧十分接近但又有别于人们常说的命运悲剧。虽然它们都关注“好人为何没有好报”这一重大伦理问题，但后者通常将苦难和不幸归咎于神秘莫测的超自然力量，前者则倾向于在人间寻找道德不公的人性或社会根源。换言之，自我牺牲型悲剧主人公的对立面是人间罪恶，此外，他们还对眼前处境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们不愿随波逐流，苟且偷安，而是奋起反抗，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美国当代作家米勒的名剧《萨勒姆的女巫》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部剧里，阿碧格·威廉斯是邪恶的化身。她通过谎言操纵同伴及其他市民，最终导致多人身陷囹圄和遭受死刑。她的作恶动机很简单，即报复将其解雇的伊丽莎白·普洛克托。此前，她曾与伊丽莎白的丈夫约翰·普洛克托有过短暂艳遇，而且仍然渴望得到他。约翰本人非常后悔一时冲动出轨，从整体上讲，他是一个心直口快、刚正不阿的汉子。此时整个萨勒姆小镇都笼罩在清除巫术之恐慌之中，许多市民明哲保身或者为了发泄私愤，先后加入说谎者的行列。为了揭穿阿碧格的谎言，约翰毅然决定在法庭公开他与阿碧格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可惜伊丽莎白为了捍卫丈夫的名声而没有配合，导致他的努力失败，而且被判行巫有罪。在执行死刑之前，法官再给他一次机会在忏悔书上签字。面对谎言与诚实，生命与死亡，约翰勇敢地选择了后者。正如他的爱妻在剧终时说：“他现在保全了美德。上帝不容许我剥夺他这种品质！”

米勒这部作品还告诉我们，自我牺牲型悲剧往往黑白分明，传递非常清晰的道德立场和伦理观念。这与中国元、明、清时代的苦戏有不少相似之处。即使在西方，着重展现善恶之争的悲剧也为数不少。许多文艺复兴前后的悲剧作家站在

贯穿中世纪的基督教伦理一边，把资本主义新人的世俗欲望看作人间苦难的主要渊源，于是出现了麦克白、爱德蒙、伊阿古和克劳狄斯这些代表邪恶的悲剧人物。他们与剧中正面人物发生冲突，上演一幕幕家庭和国家悲剧。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剧作家与此相反，他们信仰和追求个人自由，把人间不幸归咎于万恶的社会制度。在他们的作品中，努力冲破社会和家庭束缚的人物代表正面价值，他们的对立面则是邪恶的。

最后讨论的是黑格尔悲剧理论中极具争议的“和解说”(the theory of reconciliation)。在黑格尔看来，悲剧不仅展现两种对立情致之间的冲突，而且还以“这种斗争的必然解决为中心”^①。既然各执一面的悲剧人物打破了伦理实质的和谐，后者就必须通过这些人物的陨落得以复原。黑格尔的这一说法至少在两个方面站不住脚。首先，它依赖于一个无法证明的假定，认为所有历史事件和人类活动都是合理的，或者说都朝着一个既定方向向前迈进，直至完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悲剧作品之存在本身揭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事实，即我们的生活世界缺乏一个掌管正义的超级力量，否则那么多人间惨剧就不会发生。其次，黑格尔关于“和解”和“净化”的阐述都基于他对悲剧冲突的狭隘理解。在他眼里，悲剧冲突指的是两种伦理力量之间的对立，由于它们只有相对的合理性，所以必须在更高层次上得到统一。然而，在历代悲剧作品中真实出现的戏剧冲突却远远超出“两善对峙”的单一形式，它们更多是以“善恶冲突”之模式展示人间苦难。倘若在善良与邪恶之间寻求和解，听上去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黑格尔还试图重新诠释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按照他的解释，悲剧所引发的恐惧与自然灾害和邪恶势力之强大无关，而是来自对方所坚持的正面伦理力量；同样道理，悲剧所唤起的怜悯也不是类似乡村妇女对别人受难所表示的同情，而是“对受灾祸者所持的伦理理由的同情”^②。可见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新解最多也仅适用于少数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第283页。

② 同上，第288页。

演示势均力敌伦理力量发生冲突的作品。

综上所述，黑格尔的悲剧“冲突论”确实为文学和艺术评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关注点。在他之前，戏剧诠释受到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影响，沉迷于人物性格分析，忽略作品的整体构思以及作品与外部历史之间的宏观联系。然而，黑格尔的“冲突论”也有重大缺陷。除了几乎被学界抛弃的“和解说”以外，黑格尔对悲剧冲突的理解过于狭隘。“两善对峙”的戏剧情景的确令人揪心，但这远不是悲剧冲突的全部。我们有必要对黑格尔的理论加以改造，使之囊括发生在善与恶之间的较量。只有一个全面的冲突理论，才能更加有效地解释古今中外的悲剧文本。

作者简介：丁尔苏，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曾执教于苏州大学和北京大学，现任中国（香港）岭南大学英文系教授。主要学术成果包括《超越本体》（《现代悲剧》（译著）、《符号与意义》，以及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 *Parallels, Interactions, and Illuminations: Traversing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of the Sign*，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论。曾担任加拿大《符号学书评》（*Semiotic Review of Books*）杂志编委和副主编（1997—2000）、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2000—2004）以及岭南大学英文系主任，先后在欧美多家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英文论文数十篇。

（责任编辑：孟凡君）

Marx's Feminist View of Humankind'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YU Wen, LI Xiaojiang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Marxism on Chinese women is both historical and real. It has had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act on the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an for nearly a hundred years.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feminism and Marxism can be seen in Marx's own diverse roles as a revolutionary, man and scholar. Analyzing Marx's view of wo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s liberation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insights on gender in Marx's view of human history. This encourages us to take a broader view of history and use feminist thinking to gain a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framework of nature.

Key words:

Marxism; women's liberation; gender analysis; Human nature

From the "Collision of Goods" to the "Struggle between Good and Evil"

DING Ersu

(Ling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of Hegel's theory of conflict to dramatic criticism. Before Hegel's time, most critics were overly influenced by Aristotle's *Poetic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were too preoccupied with analyzing the psychological make-up of the tragic protagonist, oftentimes at the cost of neglecting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a play and its broad relationship with history. Nevertheless, Hegel's theory of tragic conflict is plagued by many problems of its own. Apart from its related "theory of reconciliation" which has been largely rejected by subsequent theorizations

of tragedy, Hegel's theory of conflict seems too narrow to be applicable to most tragic texts. This calls for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Hegel's theory so that it can also accommodate the "struggle between good and evil". Only with the help of a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conflict can we better explain the innumerable struggles of good and bad that often occur in tragic works.

Key words:

Hegel; theory of conflict; collision of goods; struggle between good and evil; Aristotle; dialectic logic; theory of reconciliation; theory of catharsis

On Georg Simmel's Sociological Aesthetics

HUANG Sheng-er

(Shih-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Simmel's article "Sociological Aesthetics"(1895) can be considered the beginning of the sociology of ar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is important text and other related texts in relation to three considerations: the power of symbols, the form of symmetry and the question of style. Simmel's concept of artwork could also be regarded as the predecessor of Adorno's aesthetic theory. Every artwork embodies the power of soul; it shows the way in which the soul works. The art work conveys the personality of the soul—the imprint of individual or nation—but, in embodying the idea, it also follows the rules of art.

Key words:

Georg Simmel, *Sociological Aesthetics*; artistic style; artwork, Sociology Theory